

故都的邊緣人

——鍾理和文學中的1940年代北京日常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1941年鍾理和自奉天轉居北京，此後旅居北京約莫六年的時間。此際1940年代的北京在日本操縱的政治、文化、經濟統治體制之下，與其他中國文化中心接觸有限，形成相對封閉的環境。來自殖民地台灣的鍾理和則選擇與同時期活躍於北京的台灣知識分子張我軍、張深切相異的道路，甚少公開參與文化或政治活動。鍾理和日記多為閱讀、省思、觀察、評論和整理報紙的日常記載，並專營文藝寫作和著述翻譯，對中國民族展開內省式的針砭觀察。細察鍾理和的戰時北京書寫，其所記述的空間物景，既是他現時生存的所在也是想像的來源，更關乎對內個人心境投影與對外中國觀察所得。承此，本文依序爬梳鍾理和四〇年代轉赴北京的原因、背景，與表現相對積極的小說、散文、日記文本內容，論析其戰時北京書寫的空間敘事特性。文本解析則取徑地景物象、民族性、出走與返家等三向度，呈現作家1940年代北京日常書寫的心象風景，與其感覺結構之於作品的互文影響，藉以刻劃戰時殖民地青年旅外書寫的空間敘事及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構圖。

關鍵詞：鍾理和、北京、戰爭時期、日常書寫、《夾竹桃》

The Outsider of the Ancient Capital:

An Analysis of the Daily Writing of Zhong Li-He in 1940s Beijing

Lo Shih-Yun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1941, Zhong Li-He moved to Beijing from Fengtian and lived there for nearly 6 years. Under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ominance of Japan during the 1940s, Beijing had limited contact with other Chinese cultural centers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losed environment. Zhong, who came from colonial Taiwan, chose a path that differed from those taken by Zhang Wo-Jun and Zhang Shen-Qi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 in Beijing at the time, and rarely participated in cultural or political activities openly. Zhong mostly used his diary to record readings, reflections, observations, commentaries, and news on the newspapers each day. In addition, he specialized in litera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making introspective and pointed observations on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alysis of Zhong's wartime writing from Beijing reflected that his descriptions of space and scenery were both of his living location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his source of inspiration; they were projections of his internal mood as well as his outward observations of China. Thus, this study sequentially sorted the reasons and background behind Zhong's transfer to Beijing, as well as the relatively active contents of his novels, essays, and dia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narrative features of his writing in wartime Beijing. The textual analysis was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landscape objects, nationality, and family and travel. It presents the intertextual effects of the mental landscape in Zhong's daily writing in the 1940s and the sensory structure in his work,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narrative depicted by this traveling colonial youth in wartime and his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Zhong Li-He, Beijing, The War Period, Daily Writing, *Oleander*

故都的邊緣人

——鍾理和文學中的1940年代北京日常

一、前言：1940年代的戰時北京與鍾理和

台灣總督府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調整對台政策，在台推行一系列殖民和強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運動」便是這環境條件下的產物。1941年殖民當局成立「皇民奉公會」，「皇民化運動」即轉入第二階段，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消弭台灣人的國族認同觀，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以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相應於殖民地台灣，中國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被日軍攻陷，翌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定北京為首都。同日日軍更在北京設立「中央指導部」，1938年1月20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則由天津遷至北京。攻陷南京後，日本政府迅速在華建立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統治體制。張泉分析日本建立的三種殖民模式：納入日本本土的殖民地模式（朝鮮、台灣）、新國家模式（滿洲國）、中國內地偽政權模式（蒙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模式。¹在中國關內（山海關以南）的佔領區，日本採取的統治策略是沿用原本中國政府的官員，以軍政組織在各地展開軍事佔領和經濟操控。此外，並於統治區域內展開日語教育和文化事業的出版宣導工作，欲透過中日文化工作者的合作協力在華戰爭的進行，以及形塑日華親善的面貌。

依據社會結構、城市性質、經濟文化面貌，北京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作為封建統治中心的「帝京」時期（1911年前）、北洋政府所在地的「舊京」時期（1911-1928）、首都南遷後作為文化古都的「北平」時期（1928-1949）、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時期。²北京雖然在1937年7月即被日軍佔領，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古都且名義上未與中國分離，日本無法如對殖民地般全面

1 張泉，〈北京淪陷期的台灣文人群落——以共時的殖民體制差異和歷史的殖民演化型態為切入點〉，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334-335。

2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台北：捷幼出版社，2006.04），頁69。

實行文化、語言的殖民化。因此，戰時北京此地的中華文化成分相對於東北滿洲、台灣等地，仍具有一定的獨立發展空間。³然而中日戰爭期間的北京，初期仍因為文人出走與社會動盪而處於沉寂階段，1939年9月張我軍〈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他〉甚至以荒蕪之地形容戰時北京文壇：

這幾年來的北方文壇，實在太消沉了。號稱文化薈萃之區的北京，近十年來便已有暮氣沉沉之象，這兩年來更是一蹶不振，整個文壇竟落到一片荒蕪之地！……北方文壇，並非沒有需要，只是供給的來源殆近於斷絕，所以中間人看這生意不好做，不敢開張罷了，然而無數的讀者層正在尋求文藝的糧食是毫無疑義的。⁴

戰時北京雖然成為日軍、國民黨、共產黨等各方勢力角逐之地，但在華北戰局穩定之後，北京的生活條件較之中國其他淪陷區則來得穩定。之後的北京文壇伴隨官辦刊物、校園刊物的出版與作家統合組織，除了官方意識宣傳的言論空間，方讓來自日本、台灣、東北以及留京的文學者擁有純文學的園地。

研究者曾就日本對文壇的統合政策，將日本支配下的華北文壇分為兩個階段：1937-1941年的中日戰爭時期、1941-1945年大東亞戰爭時期。⁵1941年移居北京的鍾理和活動時間便為第二階段的大東亞戰爭期間。日本接管北京之後，考量統治成本基本上採取間接統治的撫民政策，1937年12月24日成立負責民眾教化、宣輔工作的新民會，以此組織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相輔，從事官民一體的治理政策。戰爭時期北京文壇除了作家協會推動的協力性文學活動外，與滿洲文壇、華北文壇之間也有密切的交流。依據1943年5月6日張深切《北京日記》所載，四〇年代戰時的北京文壇為滿洲、台灣系作家主導。⁶而依許

3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台灣研究集刊》92期（2006.06），頁81。

4 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頁149。

5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頁415-416。

6 張深切，《北京日記》，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11》（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01），頁343。原文如下：「聞林房雄對炎秋謂：『現在華北文壇悉被滿洲系與台灣系占領實在可惡。』炎秋問『滿洲系係誰？』彼謂：『武德報柳龍光等翻編審會徐白林等是也。』炎秋又問：『台灣系是誰耶？』彼曰：『張深切、張我軍是也。』炎秋問曰『二人能成一派乎？』彼曰：『此二人為中心，故可謂派也。』」

雪姬的研究，1930年代在北京的台灣人大概在六十人上下，但是到1944年已達五百多人。⁷且戰時在北京的台灣人以從事教職為多，諸如：洪炎秋、張我軍、蘇子蘅、張深切、吳坤煌、劉捷等人。文化表現上，這些台灣知識分子也於戰時北京文壇多所表現，張深切的《中國文藝》擔任了文學出版的作用，張我軍則活躍於日語教育和日本文學翻譯。戰時的北京文壇就是在上述政治文化組織、間接統治方針、中日提攜氛圍之下開展，形成既政治又具文學面向的特殊文化型態。

至於學界關於鍾理和中國旅居書寫的研究，亦相對集中於北京時期的《夾竹桃》，以及1946年前後返台經驗的文本。研究角度有文學語言、形式技巧、作品思想等，當中以作家的認同研究為大宗。認同議題經由鍾理和戰後描寫中國旅居和返台經驗的小說〈祖國歸來〉、〈原鄉人〉、〈奔逃〉，剖析創作傾向轉變的軌跡，從對原鄉的憧憬、追求，乃至幻滅、批判，最後擁抱台灣的身分路徑，闡述原鄉書寫為鍾理和文化認同的入口。⁸邱秀春期刊論文〈鍾理和在中國〉上篇爬梳作家生平、著作、奉天與北京活動情形、創作風格，下篇解析文藝觀與意識形態，全盤註解日治時期鍾理和人文活動，為瞭解鍾理和中國生活的基礎參考；何淑華的碩論〈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同樣討論文化身分，但由地誌書寫的視角解析原鄉認同與故鄉認同的形構，別創研究取徑。其他相關成果尚包括作家比較、地域書寫等研究角度。⁹

-
- 7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2008.04），頁60。
- 8 以身分認同為主要問題意識者，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卷11期（1974.04），頁33-57；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10期（1984.05），頁127-146；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3期（2007.09），頁29-66；黃麗月，〈「中國作家」／「台灣作家」：夢的兩端——解讀鍾理和返台前後的的作品〉，《漢學研究集刊》4期（2007.06），頁111-138。
- 9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上）〉，《臺北文獻》149期（2004.09），頁135-189；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下）〉，《臺北文獻》150期（2004.12），頁165-200；何淑華，〈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論文，2007）；由於出身背景、旅居地點、時間、文學主題的近似，前行研究者亦常將吳濁流與鍾理和並論，例如陳富容，〈「孤兒」與「原鄉人」——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悲歌〉，《育達學院學報》12期（2006.12），頁1-19。陳文選擇「孤兒」與「原鄉人」的心理典型，討論其中國經驗和意識的成形，及如何影響創作過程；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3期，頁29-65。張文檢視兩人中國書寫的原鄉情懷，從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驗證被殖民經驗對於作家心理與文本的影響，歸納作家歷經的認同轉變。上述二文藉由文本探求被殖民者心理如何影響台人創作與認同，但屬個案式的研究，缺乏時代脈絡下兩人中國情結與認同轉折的比較過程；其他鍾理和中國經驗研究尚有由「地域」切入者，如張泉，〈北京淪陷期的台灣文人群落——以共時的殖民體制差異和歷

鍾理和1941年自奉天轉居北京，此後旅居北京城約莫6年的時間。1940年代的北京在日本操縱的政治、文化、經濟統治體制之下，與其他中國文化中心接觸有限，形成相對封閉的環境。¹⁰ 來自殖民地台灣的鍾理和卻選擇與同時期活躍於北京的張我軍、張深切不同的道路，甚少公開參與文化或政治活動，日記內多為閱讀、省思、觀察、評論和整理報紙等各種事務需要的日常記載，¹¹ 且專營個人的文藝寫作和日文著述的翻譯，展開對中國民族內省式的針砭觀察。綜觀旅京時期的鍾理和作品，積極介入非日常（戰爭時期）北京的日常空間，藉由細描、解構策略以呈現「日常北京」的「非常」。研究者指出「日常生活」至少有三種相互依存的定義，包括生活的實踐方式、美學風格或者分析概念。¹² 本文則視鍾理和的北京日常書寫為再現身分意識與文化邏輯的實踐，即由日常生活及其細節勾勒中國的變遷。承上所述，本文將由戰時旅京的鍾理和文學作品，討論其關於北京日常空間的物類描述、人物群像與家敘事之構圖，呈示四〇年代一殖民地作家既離鄉又四處尋鄉狀態下的心象風景，以及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構圖。

二、歸去來兮：鍾理和轉赴北京原因與書寫活動

日治時期台灣人往來北京的交通路線，可從張深切〈北京感想錄〉一文得知概況：「我首次前赴，是由基隆搭乘輪船抵達大連，再由大連乘坐火車經由奉天到北京的。這個行程不但花費旅費較巨，而且輪船與火車之銜接往往不甚理想，所以會使第一次前往的人感覺極大的不方便。」¹³ 由引文可知，不論

時的殖民演化形態為切入點），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頁331-362。張泉概述華北殖民體制和北京區域文學生態，以鍾理和小說審視殖民地的文學生產；王申，〈淪陷時期旅平台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分表述——以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為考察中心〉（中國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王博論以戰時旅京台灣作家群體為考察，定位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的北京活動為文化報國、奉公異聲、隱逸之姿、鄉土書寫四種類型。然此論缺乏作家赴京前在台灣或其他中國地域活動的爬梳，故對戰時文化態度的抉擇或作家思想的轉變缺乏脈絡式詮釋。

10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中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10），頁12。

11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林慶彰主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中國》（台北：台北市文獻會，2004.12），頁252-253。

12 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卷3期（2009.06），頁22。

13 張深切，〈北京感想錄〉，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11》，頁282。

是哪一種台灣來往北京的路線都需要花五至六天的日程，其不僅時效性低且花費甚巨，非一般人可以負擔。然而1944年在京台人仍多達五百多名，日治時期台灣人遠赴北京的原因可參照許雪姬的分析：其一是對於北京帝都文化的孺慕之情，對文化中國的認同感。此點或許受到1937年起台灣總督府殖民體制、政策日趨嚴厲，阻礙了台灣人文化活動所使然。這點可與鍾理和〈祖國歸來〉（1947年未完稿）的描述相呼應：「離開被壓迫著的台灣來到祖國的他們，第一個希望著的是充分的休息」；¹⁴ 其二是北京當時在日本的佔領之下，日本籍的台灣人就業狀況相對好，可成為日本體系中的中下層官僚維生；其三是受到台灣同鄉或日本人的援引。¹⁵ 至於鍾理和為何產生由生活了3年的滿洲旅居北京的想法，或許可從小說〈門〉（1945.10.15）探知：

也還是中國才算是個好地方，第一，好住、好吃、好穿！袁先生您瞧，這是滿州，是奉天，可是，不成，奉天已經死掉大半截了。您瞧瞧天津去，特別是北京，好、嘖、好哇！袁先生，去，丟開奉天，急速到北京去吧，老中國是頂喜歡您們年輕人的。¹⁶

我勸您還是早點兒到中國去好，特別是北京！哎，北京太好了！水就能夠養人。奉天卻不行，像個沒有青草的沙漠似的，瞧著，心裡頭就不好過。寂寞呀！去！袁先生，去！到北京去！（〈門〉，頁211）

中篇小說〈門〉的內容雖是描寫奉天生活，但實為鍾理和1945年10月5日完稿於旅居北京期間，內容不斷呈現貧窮、疾病、飢餓、醜惡的人性之於主角的打擊，因此字裡行間不乏人物想離開滿洲的意念。上述引文正是〈門〉的主人翁袁壽田與受聘於滿洲房產的五旬老人（天津人）的兩段談話，透過這名五旬老

14 鍾理和，〈祖國歸來〉，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5》（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268。

15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頁47-48。

16 鍾理和，〈門〉，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3》（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151。以下引文皆在文末標明篇名及頁數。

人之口不僅透露出作家對中國的憧憬與生活條件的欽羨，也呈現奉天此地對鍾理和而言並非是真正的中國。

1938年鍾理和滿洲自動車學校畢業後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1941年轉居北京，應聘為華北經濟調查所翻譯員，旅居北京約莫6年的時間。期間他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各地，謀職、訪友或旅遊考察，並以「江流」筆名投稿、出書，翻譯介紹日本文學作品。調查所辭職之後，以經營煤炭店維生，後來約有3年多的時光專事寫作和日文翻譯，極少和同鄉往來，生活由表兄弟親友接濟：

民國二十七年夏我隻身跑到東北，二十九年回台把她領走，她便是我現在的妻子。三十年我們移居北平，到了這裡，要做作家的願望才算堅定下來。以後我便把全副精神和時間都化在修養工作上。三十二年間我譯了好些日本作家的短文——有小說、有散文，曾選了一寫自己比較滿意的投報社發表。三十四年初，出版一本習作《夾竹桃》，包括二中篇和二短篇。¹⁷

鍾理和的作家嚮往雖說是自19歲戀愛受挫之後始萌芽，但移居北京一事才算真正堅定了這份志向：「三十年，他們移居北平，在文化古城中加強了他要做作家的願望，雖然他的工作一向沒有和有關『文化』有關。」¹⁸由鍾理和的寫作年表來看1940、1942年並未有任何作品完稿，1940年作家開始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並於8月領妻子台妹赴瀋陽。1942年的作家生平雖從缺，然1941年則歷經駕駛、翻譯員、石炭零售店的轉職波折，可知道1941、1942年是鍾理和決心專事寫作而不干涉任何公事與政治活動的轉折點，1943年3月即於各大報投稿翻譯小說和散文。從1938年離鄉隻身遠赴滿洲、1941年攜眷旅居北平，直到1946年方才返台的鍾理和，旅居中國時間約計8年左右。雖然鍾理和移居時

17 鍾理和，〈鍾理和自我介紹〉，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8》（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277。

18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8 鍾理和殘集》（台北：遠行出版社，1976.11），頁168。

日本政府已掌控了北京，但相對於長久落於外國勢力的滿洲，北京的文化積累與民族身分認同資源仍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¹⁹

承上所述，鍾理和與家人奔赴北京的原因，很大成份是因為內心那股對中國憧憬已久的原鄉心情，以及北京本身具有的人文地緣條件。而北京此地對鍾理和文學最大的意義，即在於1945年4月由馬德增書店出版的第一本創作單行本《夾竹桃》，內含〈游絲〉、〈新生〉、〈薄芒〉、〈夾竹桃〉等中、短篇作品；此外，透過鍾理和的日記、散文也能知曉當時北京的社會文化狀況與在京台人動態，²⁰ 可以說北京之於鍾理和的文學成長是頗具一定影響的。《夾竹桃》收錄的四篇作品，有三篇就以北京生活為背景，僅〈薄芒〉是以故鄉美濃為背景。1945年10月31日鍾理和日記中就曾記述時人對《夾竹桃》的書評：

北大化學系教師，同鄉陳先生批評我的《夾竹桃》說，由這書所表示的態度來說，是應屬於林語堂與周作人——同鄉張我軍先生亦可歸入此派——一派的有閑主義的作家的。因為曾思勉有超然社會生活之上的漠不關心的那種態度。實屬意料之外。他又說與其〈夾竹桃〉，他個人倒喜歡〈薄芒〉，這篇藝術的情緒甚為濃厚。但陳先生於林、周二氏有多少認識，那是可疑的。²¹

引文最末一句明白表達了鍾理和對陳氏評論的不滿，另一方面也透露自認非有閑主義一派的作家。鍾理和對與自己同被歸為有閑一派的張我軍，曾撰文反駁其〈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中認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青年為無國家觀念者的論點。²² 此外，觀察鍾理和的北京日記不時可見其對時局的批判，以及對在京台人處境的感慨，亦非書評所述「超然社會生活之上的漠不關心的那種態度」。

19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台灣研究集刊》92期，頁81。

20 鍾理和曾應林海音之邀而寫的〈我學習寫作的經過〉，及《鍾理和全集》共六冊，1997年發行。第6冊中有上文（頁219）及〈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頁225-233）。此外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於1996年出版《鍾理和日記》，頁1-55，為鍾理和於1945年9月9日到1946年1月16日（並非逐日記載）所記的日記，由此可見戰後在北平的台灣人及他們的遭遇。鍾理和著，鍾怡彥主編，《鍾理和全集》（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21 鍾理和，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6》（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44-45。

22 同註21，頁7。

《夾竹桃》收錄的四篇作品，可區分為三種創作類型：一是延續〈泰東旅館〉系列的〈夾竹桃〉，以及後來寫的〈地球之黴〉，以知識分子的眼光透視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探討人性與人的道德行為；其次是〈游絲〉、〈新生〉以第一人稱敘事，保持純客觀角度鋪陳情節，探討婚戀與家庭議題。戰後完稿重撰的〈秋〉亦屬此類；第三類作品〈薄芒〉，則是在北京遙寫故鄉台灣，此篇亦是鍾理和旅中期間唯一一篇以台灣為背景的作品。²³〈夾竹桃〉的內容架構與〈泰東旅館〉頗有相似之處，但時空背景置換為北京，此篇乃是作家作品裡最完整表達對中國民族印象觀感的作品。書寫風格方面，〈夾竹桃〉相較於〈泰東旅館〉少了濃烈的感性筆觸，觀察則變得更深刻入裡，屬於在尖銳冷諷的批判眼光下敘述理想幻滅的原鄉失落之作。當中作者充分刻劃一個悲天憫人的知識分子，其內心對時代、社會、眾生所蘊含的深沉無奈感。

三、1940年代的北京日常：故都邊緣人的空間敘事

鍾理和描繪北京的相關作品，包括1945年4月由馬德增書店出版的首部創作單行本《夾竹桃》，其內含的〈游絲〉（1943.08）、〈新生〉（1944.03）、〈薄芒〉（1944.05.23）、〈夾竹桃〉（1944.07.07）等中短篇作品。其他寫成於北京旅居期間的作品，依時序尚有〈泰東旅館〉、〈地球之黴〉、〈生與死〉、〈第四日〉、〈門〉、〈秋〉、〈供米〉、〈白薯的悲哀〉，描寫在京台人生活片段的戰後文章〈祖國歸來〉，以及旅居北京1942年至1946年期間的鍾理和日記。承此，本節將主要從《夾竹桃》內容出發，並以旅京時期其他相關作品記敘從旁輔助，剖析鍾理和視野中的戰時北京空間與作家內心狀態。以下將從地景物象的空間隱喻、戰時生活與人物群像、出走與返家等三個向度，呈現鍾理和北京書寫的心象風景：

（一）北京空間的敘事隱喻

敘事空間包括敘述的人物或事件所經歷或存在的具體空間，因此鍾理和作品所描述的建築、地景、物象、視角皆為討論範疇。〈夾竹桃〉是鍾理和沿

23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06），頁43。

襲〈泰東旅館〉集中某一空間書寫的設定，嘗試以中國傳統北京城的底層環境（大雜院）為小說舞台，展示北京人的生活風景：「天棚、魚缸、石榴樹！這所院子證實了研究北京人的生活風景的各種文獻。也即是說，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著北京城的全部院落。」²⁴ 這座雜院也展現北京於日本統治之下市井小民的生存狀態。從敘述可知天棚、菖蒲缸、夾竹桃並非本存於這大雜院裡的主要物景，天棚是夏日裡二房東邵成全簡單搭起的簡陋遮陽物，原用於養魚的魚缸卻被二房東太太用來種植綠葉肥澤的菖蒲，茂盛的夾竹桃更是取代半死不活的北京人石榴的位置而植於庭院。可知這三樣物品的存在是人為強行帶入或置換於這座院子中，具有簡陋、非其所用、侵入性的意味，敘事者更略帶嘲諷地以「此民族的庭院生活的三大理想」語句形容此三物。

當中篇名所陳的植物——夾竹桃，其花朵雖鮮豔芬香卻具有毒性，故事裡關於夾竹桃的敘述亦可見其負面的意涵：

人們的通性，以為開著夾竹桃的地方，那裡應須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生命，人類的尊嚴，人性的溫暖。然而天知道這院子裡有什麼。這裡漾溢著在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言語所可表現出來的罪惡與悲慘。（〈夾竹桃〉，頁74）

鍾理和直接藉敘事者之口道出夾竹桃所在的這座院子，其性質與夾竹桃鮮豔外表相反，實內含人類社會的一切罪惡與悲慘，是個缺乏尊嚴、溫暖的空間。其實院子內尚種植了石榴、麥冬草、洋繡球、海棠、茉莉、菖蒲與杜鵑花等其他植物，但是在〈夾竹桃〉的夏日時空中就屬夾竹桃、菖蒲二者脫穎而出成為院內景觀。對於人文地理學家而言，自然最主要是人類想像的對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²⁵ 基此，鍾理和不僅以夾竹桃影射社會及人性的殘忍面，菖蒲枝莖挾著金魚任其曝曬的樣態同是暗示社會的悲慘。而三大生活理想之一的天棚，則

24 鍾理和，〈夾竹桃〉，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3》，頁72。以下引文皆在文末標明篇名及頁數。

25 Paul Cloke、Philip Crang、Mark Goodwin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08），頁10。

被形容如青綠野草引誘鹿群般將院內的人吸進其內，而此處成為眾人道他人長短的陰涼之地，恰呼應了敘事者對房客如蝙蝠似匍伏的形容。

院內物景同時也有影射北京時景與人物生活的作用，被夾竹桃取代的石榴就如同院裡眾人悲慘的生活狀況般得不到陽光、雨露，為了維繫半死不活的生命，只苟安於髒亂環境裡任人剝削欺凌；除了植物的比擬，敘事者還以「衰老而灰褪的表面」的後院南屋，呼應本是雜院房東的老太太其殘朽的年齡與命運，居所建物與房客一樣的疲憊憔悴；而另住在前院南屋的林大順一家屋裡屋外塞滿變形的傢俱，居住環境如牛舍般髒亂，焦苦的薰煙味更將器皿、衣服、屋子薰得令人窒息苦惱。身為一家之主的林大順每日除了工作便是坐在炕頭出神或望著灰色牆面，在妻子面前柔順得如家畜。家庭空間的配置可以表現家庭的人際關係、經濟狀態、社會地位。上述情景不僅顯影了林大順一家生活條件的不潔、貧乏，也暗示其家庭內部倫理的失序。歸根究底林大順的精神失調亦與時局相關，七七事變讓鄉下生計更加難過之下，西服匠林大順決定從通縣來到北京城謀生，但城市生活反壓得他身軀沉重，如「永遠見不到陽光的纖弱的草」；至於〈夾竹桃〉的主人公是來自南方的曾思勉，生性富熱烈情感的他對於北京這座一家一單位的宅院覺得孤獨而冷僻，更對一道門就能隔開人的所有情感之現象感到痛恨和絕望。曾思勉以諷刺的口調形容：「悠遠的歷史，使這圈子紮得極度堅牢。」（〈夾竹桃〉，頁126）表達了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的歷史遺產，猶如枷鎖重重纏繞著這座院子和其內的居民們，形成惡性循環的深淵，且回應〈夾竹桃〉開篇將這雜院比擬為典型北京城院落的生活風景文獻的說法。

空間佈局是社會區分的直接反映，呈現了社會與空間的互動。²⁶ 在鍾理和的解讀中破落的院子是眾人的棲身所，亦是北京時下底層人民的負面寫照，宅院成了作家北京敘事裡充滿隱喻的符號與社會位階的投射。若言空間體驗是一種主觀感受，文學地景的書寫就包括人物與自然互動的情感面。例如〈夾竹桃〉最末部份季節移轉至秋日，夏日茂盛的夾竹桃也抵不過環境的變化而凋

26 同註25，頁17。

落，此處花樹的凋零便映照作者對院內世事全非的變化感觸。不單是〈夾竹桃〉，以北京為場景的〈游絲〉同樣運用物景呼應人物境況的敘事方式。庭院內那株因雨顫抖飄落的棗樹恰襯出為愛傷神的人物境況，沉鬱、蒼白、懊惱的情緒籠罩著自由戀愛受挫的朱錦芝。〈新生〉是透過石門站生氣盎然的景色描繪主角存直另一種生活態度的轉化，即象徵獲得新職業、新生命發展的「新生」。相對於新生之景，大半篇幅回憶過往失業生活的主角，回首北京僅見東邊沒於渺茫的地平線，可說北京人事徒留惘然與縹緲的感觸而已，特別是人物對親情與家庭組織的失望。

另外，關於景觀與人的連結意義，段義孚指出人類以中間景觀的建造逃離自然界的威脅，而「公園」正是種處於人造都市與大自然兩個端點之間的文化產物，不僅提供人們回歸自然的精神家園，也具有理想性與強調美好生活的意義。²⁷〈游絲〉當中「中央公園」此場景正成為錦芝與故事情節的轉折處，受到敘事者邀請走出宅院至公園散心的錦芝，這移動過程等同於進行一種逃避現實困頓回到精神家園的動作，讓人物藉此契機而得以相繼發展出因應的自我抉擇；〈新生〉場景當中具有類似作用的則是火車車廂，以火車繞過城廓出永定門郊外起筆，失業近兩年的存直搭車前往太原求職，顯見〈新生〉通篇乃是於移動狀態中回想過往時空的敘事架構：

也許車到豐台，人們便將完全滿足，而且安靜於既定的狀態與姿勢裡了吧！可是最悶人的還要算是放下窗幔，這麼一來，我們只能在這窄窄的車廂裡面的渾囂中，各自找得最宜於自己此時的心的安息與和平。但不拘怎樣，難道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靜靜的研討與檢點一下自己嗎？²⁸

時間、空間是意識經驗的基礎，引文中人物搭乘的火車雖然不斷前進行駛，但居其內的乘客卻是靜定狀態，人物思緒脫離當下回溯昔時回憶。相對於前行的

27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台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2006.03），頁31-35。

28 鍾理和，〈新生〉，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1》（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14。以下引文皆在文末直接標明篇名及頁數。

火車與象徵未來希望的求職，回憶是穿越時間、重現往日時光的心理時間，二者間形成極大反差。於此，車廂是作為一個暫時脫離現實生活的節點，得以讓人物仔細檢視自己，並省思過去兩年的生活記憶。故事最末則由回憶再度回歸車廂這個現時空間，與〈游絲〉的錦芝來到公園之後的情節雷同，思緒回到現實的存直同樣做了抉擇，尋得工作之後以存有自我意志的自己建造一個明朗、合適的家庭。

散文〈生與死〉（1944.12.23）裡的北京同樣以院子為描寫空間，喪妻的張伯和隻身靜立於院內，在香煙煙霧所形成的光影世界中回想學生時代迄今的事：「舊事如憧憧之影，在向他招手，他能夠由這些微抖的影子背後，透視他的過去，至于遠遠……。」²⁹ 世界的構成需要視聽嗅觸等感官形構，在感知的同時也是進行辨識世界的過程。〈生與死〉的空間先由遠處行人腳步聲、犬吠聲漸漸拉至院子內，再以高立的天棚、幽暗的燈光、清涼夜風、葵花、樹蔭、嗆鼻煙味等視覺、觸覺、嗅覺感官相襯院內悲戚氛圍。〈生與死〉雖未有如〈游絲〉、〈新生〉的中間景觀，但遠離市中心於胡同內的這座院子同具抽離現實時空，即暫時逃離現實而重新省視過往的空間意義。若言〈夾竹桃〉是北京生活的風景文獻，〈生與死〉便是學校、社會、家庭生活皆不盡如意的張伯和，他個人的生命文獻；戰時中國的地域區劃屢屢變遷，各地人員構成也經常流動，無疑促進地域文化以及各民族之間的接觸和碰撞。³⁰ 〈第四日〉的部舍正是各方人士於此特殊時空匯聚於日常生活縫隙之中的空間，一個脫離正常規則的半封閉空間，院內的在留邦人下棋、³¹ 宴飲、玩女人，形成了供荒誕狂歡等行徑的場合——臨界空間。³²

文學的地景空間除了展現有形的地景、地貌、無形的視野，也經常表現了時間、空間，而空間與感覺是作家進行意象與文學空間建構時不可缺少的要

29 鍾理和，〈生與死〉，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5》，頁5。

30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頁10。

31 「在留邦人」（ざいりゅうほうじん）為日文詞彙，本文保留鍾理和作品原文用詞，意指居留海外的日本人。

32 Mike Crang（麥克·克朗）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09），頁161。臨界（liminal）空間意指形成於日常生活的縫隙中，脫離正常規則且分離而出的二元相對相轉的空間情境。本文借指鍾理和文本中介於異鄉與故鄉之間的流亡空間。

素。鍾理和筆下故事人物的北京是由帝京轉型而來的公共景觀，摩登消遣和古蹟奇觀比鄰交錯的並陳物景。不論是《夾竹桃》的曾思勉、錦芝、存直，還是〈生與死〉的張伯和、〈第四日〉的小松，故事皆以物景映照人物狀態或心境的描寫，且主人公亦都進入了一個宛如與外在現實暫時隔離的空間（大雜院、公園、車廂、部舍）。〈夾竹桃〉的院落是代表北京「生活風景的各種文獻」，〈生與死〉的院子為回憶生命風景的處所，〈游絲〉的公園是錦芝與心儀對象相逢之地，〈新生〉的車廂與〈第四日〉的部舍則使主角存直、小松再度檢視自己。上述故事敘事角度皆為第一人稱（曾思勉、張伯和、曹先生、我、小松）的自知觀點，故事人物又分別在這些地點進行敘事、抉擇、回憶等自主活動，人物的身體置身其境成為此空間與現實的接點，即外在的世界經驗與內在的心靈經驗的連結。

整體而言，鍾理和的北京書寫是將客觀存於環境中的事物，化為凸顯人物行動或處境的背景。而且其敘事方式皆表現出景觀是一種由人物心智和感覺所投射而成的意象，換言之這些物景意象所承載的內在情感意義，對鍾理和而言反倒較作為北京外在環境來得深刻。此外，作者對院子昏暗、骯髒、潮濕的空間與不公平的資源分配之描寫，也明顯具有以小喻大，將北京這院落比擬中國社會的具體顯像的用意。鍾理和描寫的北京地景與物象一方面呈現物質條件如何參與生活空間、呈現人物內外狀態，另一方面更影射了戰時生活型態與時空秩序之下的各國族處境。透過下一節人物群像的民族特性討論，將能進一步呈現鍾理和對戰時北京人事的觀察與批判。

（二）民族性的風景文獻

民族的性格與特性往往與生活環境有著密切關聯，而北京作為中國傳統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本身承載著三種文化特性：「反映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與之相伴而生的知識分子文化，以及作為地域文化的市民階層的民俗文化。」³³ 承此，〈夾竹桃〉可謂透過北京城的一隅宅院呈現這三種文化

33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頁113。

的交混面貌。〈夾竹桃〉的描寫內容與結構和〈泰東旅館〉頗有相似之處，但背景置換到北京，堪稱鍾理和作品裡全面表達對中國民族印象觀感的小說，特別是對人性的觀察及批判。本篇比起〈泰東旅館〉已經沒有濃烈的感性筆觸，觀察變得更加深刻銳利，字裡行間通篇貶損而無一句褒揚，缺乏對未來的展望性。同時代謝人堡對《夾竹桃》的評價為：「寫盡了南北民間許許多多的生活。他不但暴露了中國的強韌的民族性格，並且把青年愛情的心境和倫理，寫得栩栩如生。……〈夾竹桃〉成功之點，是在這篇的故事，和描寫人物的情節的有趣。」（粗體字為筆者所標）³⁴ 奔走於複雜政治文化空間的鍾理和，不斷糾結於殖民主日本、淪陷區中國北京、殖民地台灣的多重認知，經常面臨身分問題與文化交匯的衝突。而1940年代北京政治文化重層複雜的環境，更形激化鍾理和的北京書寫呈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內心對社會、各社群的異己感，特別是對殖民政權下畸形的資產階級經濟、市民階層人性的批判，以及民族認同的自我懷疑之感覺結構。

在敘事者的描述中〈夾竹桃〉的大雜院充滿了一切醜惡與悲哀，毫無人類尊嚴與人性溫暖，並形容院裡空間只需「上覆之以蓋、下撐之以物」就算可居之處，不論裡面的房客是人還是動物，彰顯住客們是適應性極強的一群：

這院裡的房子，和北京其它院裡的房子一樣，很少有人知道，或者確實一點說，能夠知道實在有多少間。據此地人的算法，只要是上覆之以蓋——（中略）下撐之以物——……那就不管它是垃圾堆，狗窩，茅廁，即不管是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住的，或是人類以外的動物住的，即以一間數之，……幸而此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他們得天獨厚地具備著人類凡有的美德，他們忍耐，知足，沉默。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們那已昏暗，又骯髒，又潮濕的窩巢之中，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於是他們沾沾自喜，而自美其名曰，像動物強韌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堅忍的適應性啊！（〈夾竹桃〉，頁74-75）

34 謝人堡，〈談《夾竹桃》〉（1945.07.08北平），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8 鍾理和殘集》，頁159。

除了如垃圾堆、狗窩、茅廁的房子樣態外，敘事者更以相當諷刺的口吻描繪住客們是世界上忍耐、知足、沉默的優秀民族，能如動物、野草般忍受如此不堪的居住環境。而院內多達16間的房子當中，勉強保持房子模樣的僅算是敘事者曾思勉所住的中院3間北房，此鋪陳也帶出敘事者與其他房客們的差異及客觀距離，具非我族類之感。

從環境、房子、房客各方面的形容，已足見鍾理和企圖描繪淪為日本佔領區後底層的北京生活圖景。特別在人物群像的描寫經常使用動植物的意象刻劃其負面形象，例如以「蝙蝠似的匍伏」形容居於宅院的房客們鎮日渾渾噩噩，暗示他們對自我、社會都缺乏省思能力，蟄伏偏安於這不像房子模樣的髒亂空間中，毫無目的地虛耗光陰。而這些房客們的出身背景也呼應〈夾竹桃〉開篇所示「北京人的生活風景的各種文獻」，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人匯聚於此，背負著不可逃脫的命運於北京苟且過活；而生活狀況方面，這群人猶如「生長在磽瘠的砂礫間的，陰影下的雜草，他們得不到陽光的撫育，得不到雨露的滋養」，從描述中可見對敘事者而言，北京一地的環境是貧瘠的砂礫，籠罩於此地的陰影除了意指淪陷區生活的日本軍事威脅外，更有亂世中社會生活條件低落動盪的意涵。因此，生活在這座代表北京城全部院落的宅院的人是得不到任何陽光、雨露的滋養，而由〈夾竹桃〉最末結局住戶搬遷、房東變動的安排，也呈現就算是僅維持最低生活條件的人，生活狀況也是每況愈下。尤其本是房東岳母的南屋老太太最終淪落至街頭乞討，前後人生變化都為經濟條件所左右的境況，正扣合敘事者對民族一旦貧窮便將走向破滅的預言。

〈夾竹桃〉故事開篇鍾理和即運用極大反筆呈現北京城內的眾生相，不僅透過前中後屋院層級呼應了北京城市社會特性之一：長久作為政治權力軸心的等級制度之社會分層現象，³⁵以經濟條件決定人的地位高低。甚至這些房客們的形象也多以動物相比擬，形構戰時北京的非人生活型態：「他們恰如棲息在惡疫菌裡的一欄家畜，如果不發生奇蹟，那麼，他們結果是祇有破滅，而從世間消逝了他們的種類。」（〈夾竹桃〉，頁84）就文中曾思勉的觀察，房客們

35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頁70-71。

就像化身為家畜被動地生活在北京這個惡疫菌中等待毀滅，生命毫無任何希望可言。在這樣的價值基準上，來自南方的曾思勉面對這一群思考方法、生活觀念、判斷力各方面，皆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北方住客，直白提出他所觀察到的眾生相特性，首先是「宇宙間的一切惡德的堆積，看見了滾轉在動物的生存線上的人類的群團。」（〈夾竹桃〉，頁84）換言之，被豢養在北京這座大型畜欄的房客們，在其生命得不到自由的前提下，道德、法律、秩序、人性並非其生活所必備的要項，他們只得追求同動物般最低限度的生存狀態。因此共處一院的鄰居卻對彼此不相聞問，淡薄人情、自私怕事的人生觀也令曾思勉對北京生活無所適從，甚至對自己和此院裡人的民族關係抱持極大懷疑。這疑問亦是旅居中國8年的鍾理和所投射的心理，同時期作品〈新生〉存直、〈生與死〉張伯和、〈逝〉王先生也對生命充滿質疑情緒，表現作家心理狀態的浮動與認同問題的矛盾。

其次特性為「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條牛那麼孜孜地勞動著，從不知疲倦」的「知足」，這裡的「知足」並非是正面意義的描述，因為這種精神狀態是建築在無知、不潔和貧窮之上，而妥協屈服現實生活的奴性表現。敘事者分別以前院林大順喪失思考能力的無感狀、中院魯啟仲滿意週歲孩子溫飽的低度需求、後院二房東邵成全日復一日慨嘆工作卻又無心改變的表現予以描寫，嘲諷院內的人皆具此項通性；最後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懶怠」，鍾理和甚至將這特性形容為「像北京城的乞丐一樣，充斥於我們的人類社會」般的平凡現象。³⁶ 透過〈夾竹桃〉內居於大院子的眾人便能將這三個特性一覽無遺，〈夾竹桃〉即為鍾理和眼中北京社會的縮影。

特別的是，描寫北京生活的〈夾竹桃〉，其敘事者曾思勉並非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而為成長於醇厚南方環境的異鄉人。因此初來乍到北京的曾思勉對院內街坊感情上的冷淡感到不適應，甚至滿懷著痛苦、懊惱情緒。南方出身的人物設定或許可想作是鍾理和高雄美濃出身的背景投射，且疏離的異鄉人敘事角度之設定，更可從邊緣性的觀察位置，對民族、國家與社會議題展開質疑與分

36 鍾理和，〈夾竹桃〉，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3》，頁87-88、89。

析。1941年轉赴北京的作家雖然已在關外滿洲生活了3年，但一進入到嚮往已久的中國可想而知仍是滿懷期待的。然而從完稿於1944年7月的〈夾竹桃〉內容判斷，可知此作一方面呈現作家近3年對北京各面向的整體觀察，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中國現狀失落、悵然的感觸：

曾思勉對此院裡人，甚為不滿與厭惡，同時，也為此而甚感煩惱與苦悶。有時，他幾乎為他自己和他們的關係，而抱起絕大的疑惑。他常狐疑他們果是發祥於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著同樣的血、負著同樣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人種。（〈夾竹桃〉，頁84）

國族的感性基礎是血緣、地緣、語言的共同體，³⁷但是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的殊異讓曾思勉對自己與院內人（中國民族）間的感性基礎感到疑惑，甚至產生認同問題。「人」的問題可謂是鍾理和書寫北京的思考關鍵，面對四〇年代經濟崩潰和軍政危機的北京，³⁸鍾理和不僅以院喻國地刻劃中國不圖振作、愈趨沉淪的生活圖景，更以〈夾竹桃〉裡的女房客警示中國未來命運的晦暗。

當中因虐待孩子而被黎繼榮批判為「中國的後母」的林大順後妻，接續引發了曾思勉和知識分子黎繼榮（哲學系學生）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然而曾、黎兩人討論焦點並非是林大順妻子虐待孩子一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兩人相左的處世態度以及中國現狀問題的癥結：「至於我們的問題，是在於怎樣來維持我們的生命，並且怎樣來排除能夠威脅我們生命的一切障礙。」（〈夾竹桃〉，頁126）曾思勉認為當前中國人首要問題不是道德修養或人道主義，而是最直接的生存現實——維持生命。生理需要（食衣住行）才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大半生奔波、操勞於生活經濟的鍾理和感觸必然深刻，類似的求職、生存的情節亦見於〈新生〉、〈生與死〉、〈逝〉等旅京作品，推想異地的生活經驗更形加重此類情緒。承此，生存現實與家庭組織的危機、崩壞，方為鍾理和北京書寫所要呈現的癥結所在，而引致這危機的正是中國固有的腐敗歷史慣習。

37 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台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2013.02），頁406。

38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頁14。

於是，開篇作家就將〈夾竹桃〉定位為北京的生活文獻，藉以道出中國人國民性的通病，更以院內五個家庭的命運與處境扣合曾思勉對中國民族陷於惡性循環狀態的觀察：

他們在運命的圈子裡走著，摸索著，但他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有時候，他們像反應地想逃開這圈子，不管是意識著，或無意識的。（中略）但是悠遠的歷史，使這圈子紮得極度堅牢。（中略）何謂運命，拆開來說，便是，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沒有住宅，不潔，缺乏安全可靠的醫療，教育不發達，貪官污吏，奸商，阿片，賭博，嫉妒新制度和新的東西的心理……。（〈夾竹桃〉，頁126-127）

曾思勉認為「歷史」的負遺產讓背負的中國人作繭自縛，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貪官污吏、賭博等負遺產，交相組構了令人永遠逃脫不出的惡性循環。〈新生〉裡失業的存直也深切感受生產能力、守舊、貧窮之於個人社會位階，以至於家庭內地位的影響。可見深受魯迅影響的鍾理和同樣以社會批判者的位置觀察中國社會，尤其是小市民劣根性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³⁹承上所述，鍾理和筆下的北京從原初嚮往的文化故都，轉變成惡德匯聚之所。當中的觀感落差正可以〈夾竹桃〉最末敘事者對北京城徒留類似憎惡與鄙夷的感情，予以註解。

（三）出走與返家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描述鍾理和的職業生涯從未安定，⁴⁰貧窮加之長期病痛對作家精神的折磨，貧病交加或許予以作家生活加倍壓迫的苦悶和悲憤情緒。加諸鍾理和的生命經驗與異地生活體驗，致其作品中經常安排人物自家園出走的相關情節，北京書寫的系列作雖與自傳性小說相比此類情節比重較

39 錢果長，〈魯迅、鍾理和比較論〉，應鳳凰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1 鍾理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165-166。

40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8 鍾理和殘集》，頁167-168。

輕，但〈夾竹桃〉、〈游絲〉、〈新生〉等篇仍可見出走的痕跡。麥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指出家園給人歸屬和安全感，但同時也是一種囚禁人的封閉空間。男性往往透過離開家園證明自我能力，而女人則是創造並維護之。⁴¹ 鍾理和作為追尋婚戀自由而出走的實踐者，可謂回應了克朗《文化地理學》對家園意義的詮釋，其文本書寫與經歷甚至一併將女性帶出了家園。緣於對「出走」的生命意識，鍾理和自滿洲題材的作品開始便不乏關於交通經驗的描寫情節，特別是鐵路、道路、航線等直接橫越於地景、空間的交通運輸方式。展現作家始終處於一個移動的位置，擴及筆下人物之於故鄉、家庭、生活一切都呈現未定的游移狀態。

定居北京5年的鍾理和，《夾竹桃》的北京書寫雖未有船旅描寫，但〈新生〉和描寫滿洲生活的〈門〉同樣有人物搭乘火車赴其他縣市求職的場景。火車將鄉野、都市各地的人群串流匯聚於一處，改變了人際關係，並使列車車廂成為室內空間中人與人實體距離最接近，但相對亦具心理距離的現代空間之一。火車不僅是現代化工具和機械的表徵，更在鍾理和作品裡承擔重要的敘事功能，於敘事中擴大人物的空間感和空曠感。求職情節的沿用可以想見是採自鍾理和親身的中國經驗，而文本如出一轍使用火車襯托旅途的複雜心情，除了強調人物求職若渴的行動力外，更特意藉由火車車廂此一日常生活的縫隙空間開展人物思緒，倍顯其孤絕感。〈門〉雖僅寫了回程的乘車狀況，但主角在人潮川流不息的車站和車廂之間只覺濃厚的孤獨與寂寞：「而今，我又在火車上了，像失群的孤雁，指著南邊天空，想逃回自己的故巢」（〈門〉，頁187）；〈新生〉則是在嘈雜的人聲中兀自思考人生問題，同樣與身旁人群存有隔閡而彰顯孤獨感。這樣的情感表現實乃回應了新式交通方式對人們的生活節奏和時間距離感知的改變，並象徵人物在其固有的日常生活秩序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城市是一個具有很多可見度高符號的意義中心，本身象徵著穩定的人造秩序。⁴² 從鍾理和的滿洲書寫開始，其作品即常出現以交通工具比喻人事物狀態

41 Mike Crang (麥克·克朗)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62-65。

42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03），頁166-167。

的筆法。例如〈新生〉首段便以黑暗中奔馳的火車意象襯出人物內心的激盪起伏，亦藉由火車駛出北京永定門的場景描寫，暗示人物正處於逸脫城內日常生活軌道的特殊狀態：

火車不停地在黑暗中向前奔，輝煌於夜空的人間燈火，漸隱漸疏而至於沒有時，火車已經繞過城廓出永定門郊外來了。……可是最悶人的還要算是放下窗幔，這麼一來，我們只能在這窄窄的車廂裡面的渾囂中，各自找得最宜於自己此時的心的安息與和平。（〈新生〉，頁14）

鍾理和除了以離開城門的奔馳火車烘托求職心切的情緒，也有暗示思緒進入至快速運轉的回憶狀態。作者對於「家」亦以「我家是滿蓄著西北風向前駛的一隻船」予以形容，而如船行駛的家卻在人物失業之後一夕崩壞，令主角不禁自問：「支持家庭的倫理與經濟的組織發生變化了嗎？」前文既已提過鍾理和一生處於奔波流離的狀態，但另一方面這種流離狀態並不意味與原鄉斷然分離。段義孚認為人類生活是二元活動，既要自由也需要依附。⁴³ 因此，為追求婚戀自由和身分歸屬而旅居中國的作家內心亦常感到不安與疏離，對於具有依附與安穩性質的「家」的感知是極為敏銳，這特性尤其表現在作家返台前的作品經常探討關於家的倫理與經濟問題之上。

既非完全與新環境融合，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的若即若離處境，此一存於中間的邊緣人感覺結構亦投射在鍾理和作品中，特別是人物的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描寫。例如1945年書寫北京在留邦人的〈第四日〉，當中的日本軍人們掛念的也是家園：「他們的話說來說去都離不開一個小小的願望：家園、家業、生活、老婆和孩子。總之是：回去！回去！」⁴⁴ 鍾理和的旅中經驗提供了觀看中國事物的另他角度，〈第四日〉的人物群身分雖然為日籍軍人，但鍾理和卻能深切刻劃這一群軍人頓失認同的焦慮與邊緣感。由於作家長期處於複合民族的生活環境，作品當中的中國人、台灣人抑或是日本人都有一個共同生活特質

43 同註42，頁49-50。

44 鍾理和，〈第四日〉，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1》，頁51。

的感覺，也就是歸鄉感。而這類的生活感覺於中日戰爭結束後愈趨強烈，一方面是大環境下台灣人處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尷尬位置，另一方面則是鍾理和面對中國戰後時局的心境變化所致。

值得注意的部份，是鍾理和寫出了人處於中間流離狀態的孤絕感，也道盡了對家園的依附性。他的中國書寫所蘊含的大量回憶片段，即是一種尋覓的動作，近代生活的交通使他對家園可望且不可卻。文化地理學者認為男性是為了返家而離家、為了壯大家園而離家，無論如何終究是會回歸家園的，因此出走成為一趟尋找主體的旅途。〈新生〉最末「是呀！只要火車到了太原……」（〈新生〉，頁28）一句便蘊藏了人物企圖以工作為基點而重新建構家庭、生活秩序的理想。為了求職人物清晨搭車奔赴太原，車上主人翁回首北京只見「東邊溶沒於浩淼而深幽的闔靄裡的渺茫的地平，遮著來路而已」（〈新生〉，頁27），化為飄渺一線的北京相映出人物心境的惘然，更顯得這趟火車的旅途對故事主角存直而言乃象徵著希望：「大概再過半小時，火車就將駛進石門站。經過昨晚一番夜雨洗滌過的這地方，是多麼的有生氣，多麼的青蔥可愛呀！」（〈新生〉，頁26）人物乘車離開北京的最終目的仍是期盼回家，回歸既有的生活狀態。足見離鄉追求婚戀自主，其後不如意的滿洲生活與1941年攜眷遷居北京的流轉經驗，致使在鍾理和創作量漸多的北京期間，中國書寫始終存有「家」的影子，甚至不斷釋出返家的歸屬理想。

人類生活或互動的意義，是鍾理和小說中的構築要件之一。而在出走與返家的旅程中，鍾理和從不以孤立的方式看待中國，北京的社會情景與生活互動每每能引領他聯想台灣狀況與個人經歷。正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述的邊緣人物的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⁴⁵鍾理和藉著內心並置的情境能客觀分析事物現狀，將四〇年代的中國情境視為人們歷史選擇下所造成的社會現實。〈游絲〉一樣以「人與人間所摩擦而成的合理的事實的總和」形容左右人類命運的構成內容。此觀點於〈夾竹桃〉曾思勉對院內眾生處境的敘事分析已有充分展現；這種雙重視角的情境並置，同見於〈門〉求職受挫的主角心

45 Edward W. Said（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1），頁96-98。

頭不時湧上歸家衝動的情緒：「同時翹首南望，心兒也就馳回了數百里外，在遙遠南空之下的家裡去了。」（〈門〉，頁184）旅居滿洲的袁壽田遙望的不是奉天的現居所，而是數百里之外的故鄉台灣；〈夾竹桃〉的曾思勉也以南方故鄉對照北京情境，感慨己身對北方生活的不適應。

薩依德認為即使並非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有可能具有流亡者的思維方式。⁴⁶ 因此，鍾理和奔走異鄉的經歷不僅意味著具有自尋常生涯解放，拋卻傳統秩序束縛的可能性，更使得以依循流亡者模式來探索、思考、批判事物的視野。縱然面對權威或是既有社會框架，鍾理和的小說人物常常是一敗塗地的，甚至被家庭秩序與生活圈所排斥。但是鍾理和中國書寫裡那些出走的人物，仍持續建構「家園」、嘗試回歸家園、思考家的意義，並非就此拋卻而棄之不理：

有了圓滿的生活，然後才会有圓滿的家庭，生活才是團結家庭的最大力量；倫理組織是生活派生出來的社會秩序；而我的地位與尊嚴，也就是因為我能夠幫助家庭的生活的有用的一員。（〈新生〉，頁16）

鍾理和的生命經驗與文化體驗，讓他深切體悟到生活價值的凝聚乃在於家庭。家庭成為生活價值的中心，於是「返家」成了作家最終的心理需求、社會身分的特殊需求，以及精神上的靈性需求；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鍾理和面對家庭保持一貫的流亡者視角，透過人物行動批判家庭內部問題，例如：〈游絲〉的朱錦芝樹起意志違抗父命、衝撞體制，追求自己想望的愛情；〈新生〉的存直藉由失業後的己身處境，直言家庭如公司行號般利益取向；〈夾竹桃〉透過院內五個家庭的命運與處境，呈現戰時社會與固有制度崩毀了家庭結構；〈生與死〉攜妻遠赴他鄉的張伯和，則不敵社會固有價值觀落得家破人亡；〈第四日〉雖寫在中日人對戰後生活的無所適從，同時也間接批判國家體制之於家庭、生活的壓迫。

46 同註45，頁101。

四、結語：「非日常」正視下的歸鄉書寫

本文由空間地景、民族性、出走與返家等北京空間的書寫向度，解析1940年代鍾理和的心象風景，與其感覺結構之於作品的影響。日常生活是人類生存的背景基礎，日常敘事為各種權力、知識、性別與利益的再現場域。鍾理和的北京日常圖像充斥著個人感知與文化關懷，文本空間與他的生活經驗穿透交織在一起。其呈現的方式乃將其視野與情感投注於物景之上，故時常可見物景寓有深刻的情感性，且具回應人物處境或命運之作用；此外，其中國書寫經常運用某一固定空間配置或生活秩序，表現人物彼此的關係，與其經濟狀態、社會地位、人際關係等，顯示鍾理和慣以人與人之生活和互動狀態來觀看、認識、理解中國；至於戰時北京經濟、政局動盪不安之非日常時局，連帶影響市井小民外部的日常生活與內部的性格慣習，外在環境條件的困頓混亂與人民劣根性的文化心理結構交相作用，致使鍾理和旅居中國時期的作品情緒多是悲觀、傷感：

從理和先生的作品中，讀者也許會看出他是一位不快樂的作者，因為在他的作品中，難得——不，簡直從沒有看見過「歡樂」與「談諧」的場面，而多的是「悲憫」和「憂傷」。每讀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沉重起來，有欲哭無淚的感覺。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賣弄筆墨來賺取讀者的眼淚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寫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著無限的辛酸，筆觸所及，不由要流露出來。⁴⁷

人的感覺結構被人情、生活、文化等元素所具體構成，所以寫作和生活的辛酸讓鍾理和作品每每充滿悲憫、憂傷的情緒；戰時北京殊異的社會文化空間，則令作家文本深受殖民政權下畸型的資產階級經濟、市民階層人性的批判，以及民族認同的自我懷疑之感覺結構影響，這也是作家與環境要素互動的自然結果。

47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8 鍾理和殘集》，頁164。

鍾理和中國書寫裡那些出走的人物，仍莫不處於一個返家的路子上。這樣的寫作傾向則與作家本身與中國、台灣兩地若即若離的身心狀態有關。此一存於中間狀態的流離感覺投射在鍾理和作品中，所展現出的就是北京書寫裡對中國物景、生活、人的判斷與評價，並反身對台灣有所思考。正因如此鍾理和旅京期間不僅寫中國，也寫故鄉美濃。跨越地理疆界的他地生活，牽引作家再度回到自己的文化脈絡，在此雙重的面對之中觀看中國，也同時不斷確認自我位置。鍾理和藉北京日常敘事流露出重視現時社會與生存問題的特質，也藉由北京日常生活空間的文學檢視表達了個人意識及國家機器之間的協商與抗衡。因此，鍾理和文學的四〇年代北京書寫亦是一種紮根於生活現實的文學形式，於貼近生活日常中展開與當下土地、社會的對話。

1945年日本戰敗後，鍾理和仍在北京居留至翌年3月29日方搭船返台，正式結束了1938年起的中國旅居生涯。戰後鍾理和為何在初期繼續留在北京生活，其文友書簡提到光復後不選擇返鄉的原因：「台灣的光復，是我們沒有料想到的。當初，我們原抱定了誓死不回的決心出走的。這裡面，除開個人的原因外，似乎還有一點民族意識在作祟。」⁴⁸可知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地環境與鍾理和爭取婚姻自由之故，讓他之以下定決心離鄉背井另啟新生活。旅居中國之前鍾理和透過文學文化間接認知原鄉，1938年奔赴奉天之後鍾理和得以於生活中親炙原鄉。但由其中國書寫的相關作品之完稿時間與內容，諸如〈海岸線道上〉（1946未完稿）、〈祖國歸來〉（1947未完稿）、〈原鄉人〉（1959.01.27）等篇，顯現持續尋求中國與台灣對等結合的鍾理和，已對光復後的中國感到失望而決心返鄉，藉以重拾國族認同感與尋求自我定位。可謂作家的文化身分意識或主體建構，是在與中國的對話中萌發形構。⁴⁹在此主體認同姿態及心路歷程下，由中國返台的移動過程與其間所產生的身分流動及感懷，便為作家戰後書寫的另一重點。

48 鍾理和，〈致廖清秀書簡〉，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7》（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頁137。（1957年10月30日）

49 楊傑銘，〈論鍾理和文化身分的含混與轉化〉，應鳳凰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1 鍾理和》，頁292-293。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06）。

林慶彰主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中國》（台北：台北市文獻會，2004.12）。

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台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2013.02）。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台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2006.03）。

——，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地方與空間》（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03）。

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

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8 鍾理和殘集》（台北：遠行出版社，1976.11）。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中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10）。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11》（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01）。

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06）。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台北：捷幼出版社，2006.04）。

應鳳凰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1 鍾理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

鍾理和著，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 1》（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新版鍾理和全集 3》（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新版鍾理和全集 5》（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新版鍾理和全集 6》（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新版鍾理和全集 7》（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新版鍾理和全集 8》（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9.03）。

Edward W. Said（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1）。

Mike Crang（麥克·克朗）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

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09）。

Paul Cloke、Philip Crang、Mark Goodwin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0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
10期（1984.05），頁127-146。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上）〉，《臺北文獻》149期（2004.09），頁135-189。

——，〈鍾理和在中國（下）〉，《臺北文獻》150期（2004.12），頁165-200。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卷11期
（1974.04），頁33-57。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台灣研究集刊》92期
（2006.06），頁80-88。

張淑麗，〈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卷3期（2009.06），頁22-
28。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
學報》3期（2007.09），頁29-65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
（2008.04），頁33-84。

陳富容，〈「孤兒」與「原鄉人」——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悲歌〉，《育達學院學
報》12期（2006.12），頁1-19。

黃麗月，〈「中國作家」／「台灣作家」：夢的兩端——解讀鍾理和返台前後的作
品〉，《漢學研究集刊》4期（2007.06），頁111-138。

（二）學位論文

王申，〈淪陷時期旅平台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分表述——以張深切、張我軍、
洪炎秋、鍾理和為考察中心〉（中國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
文，2010）。

何淑華，〈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
論文，2007）。